

## “诗为活物”之因的接受诗学辨异

刘 静

(江南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诗为活物”为钟惺梳理《诗经》的流传、徙变所成之观点,主要阐明“诗”为“活物”的特性与成因。“诗为活物”说与西方接受诗学多有相似之论。然“诗为活物”说为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关于审美接受理论的一种独特创说,它与西方接受诗学在关于文学本体与“接受过程”的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异。文章拟就“诗为活物”说与西方接受诗学的理论加以辨析,以期透过中西两种接受诗学的互照,抉发出中国接受诗学的奥妙精微之处。

**关键词:**“诗为活物”; 接受诗学; 文本多义性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09) 03-0075-03

## Analysis of “Poetry is vitality” and Acceptivism Poetic

LIU Jing

(Literature Instituit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view of “Poetry is vitality” which is describing this theory’s characteristic and formation was raised by Zhongxing. He got this view when he was sorting out the *Book of Poetry*’s spreading and its variation.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Poetry is vitality” and the Western Acceptivism Poetic, however, “Poetry is vitality” is an unique theory of the Chinese classcial poetry system concerning aesthetic accepted theory. It’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accepted theory not only in the literary noumenon expatiation, but also in the accepting process. By inter-comparative this two theories, we can see the profundity and imperceptibility of the Chinese Acceptivism Poetic.

**Key words:** “Poetry is vitality”; acceptivism poetic; multivocal text

—  
深度。

“诗为活物”说是钟惺在梳理《诗经》的历史流传与徙变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在《诗论》一篇,钟惺开宗明义说:“《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这是说,《诗》作为“活物”,存在于“可以说”与“不必皆有当于”《诗》的两极之间。所谓“可以说”,是说《诗》的文本是一种底据,是读者阐释的根本。始如“《诗经》之所以为‘经’,

是因为它义理至一”，但这个底据在读者的解释中是变化的、流动的，因而它同时“又义理无穷，人们可以‘执一而发万’……联想、引申，自由理解，灵活运用。”<sup>[2]</sup>钟惺强调，读诗决非拘泥于原意，僵止于一家之说，诗间是在不断的流变中被赋予新意的。而譬如《诗经》，就经过了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家弟子的不断释读，乃至韩婴和汉儒的删诗、引诗、论诗、赋诗等诠释阐发，在被他们“各取所需”的截取中被推向了似乎永无定解的终极。因此，诗的存在是一个“活体”性质的多元含义的创造体，诗的文本和读者的演绎，促成了诗作为活物似乎有某种“定质”却又总是在衍生“新质”的趋向性实体性质。

## 二

对此，在三百多年以后的西方，以姚斯、伊瑟尔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做出了与钟惺十分惊人的相似结论。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界。”<sup>[3]</sup>伊塞尔也说：“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科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sup>[4]</sup>因此，“文本和读者的相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sup>[5]</sup>在西方接受美学的倡导者看来，作品文本与读者是文学阅读的两极，正是这两极的交融相会促成了文学阐释的新意义。显然这种观点与“诗为活物”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诗为活物”说进行分析，特别是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对之进行诠释，会发现钟惺所称之“两极”与西方接受美学仍有含义上很大的差别。

首先，在钟惺看来，作为“活物”的诗文本，本身就是“活”的。之所以为之“活”，是因为诗文本的存在状态始终是“流动”的，它的多义性是由它的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中国古代诗词乃是一种高度浓缩的艺术结晶体，其语言艺术形式造成其辞简意丰、文约意广、意旨难归的特点，因此诗歌本身之存在就具有“活”的特性。这种“活”的特性使得一首诗的部分章节与整体全篇缺少了严格的关系界定，似乎可以随意拆分，独立理解，富之活意。正如钟惺所言：“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

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诗论》）正是诗之为活的文本特征为读者的“断章取义”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在西方学者看来，文本解读的多义性根源在于文本一极乃在于作者预设了“不确定性”于文本之中。伊瑟尔认为：“审美反映论根植于文本之中。”<sup>[6]</sup>而文学文本作为一种具体的话语系统，是由作家选择一定的语言材料并按照艺术世界的诗意图逻辑所创造的。正是作家的选择使得文学表现形态的意义组合对现实世界产生陌生化的疏离效果，构成了一个人们似乎熟悉却在阐释中不断萌生新意的世界。在这个文本世界中，文本意义的不确定留下了所谓的“召唤结构”，由它“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sup>[4]</sup>

其次，在钟惺看来，诗之为活物，还在于读诗者之“读”也是“活”的，即所谓“说经者盈天下”。有多少读经说经的人，就有对经的多少说法。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自己主观经验条件的变化也会对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尽相同的体认和新的解读。钟惺在自己读《诗》的整个过程当中，特别体会到读者接受的再创造性。他说：“予家世受《诗》，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浏览之，意有所得……再取披一过，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觉有异于前者。”当友人追问他：“子能更取而新之乎？”时，钟惺肯定地答道：“能”，并反问道：“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由今之视前，何不能新有之？”（《诗论》）钟惺把这种时读时新的原因归之为“趣以境生，情由日徙”，正说明读者内在主观因素及其能动的审美活动是“诗”之为“活物”的决定性动因。

同样的问题，反映在西方接受美学那里，把“期待视野”看成更根本的东西。所谓期待视界，指“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sup>[3]</sup>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认为，读者在阅读时总是会将阅读的文本与自己的生活实践经验视野相交融，在两者的调节过程中走向新的意义世界。“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立自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这种解释意在表明，“期待视野”是一个不断改善、建构的动量，它使阅读者凭借自己的阅读经验，在阅读过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而得以

在广阔的视域中尽情地发挥其审美主观能动性，赋予作品以不断更新的意义。但我们注意到，在强调读者的经验视界与文本视界的交融时，读者的作用被特别地放大，甚至有些绝对化了，似乎读者能够判定一切，读者是使作品内在规定性被凸显的最根本的原因。至于作品本身的存在，作品本身的意义则因强调读者，无形地被淡化为一个没有实体意义的待开放系统，这必然导致走向阐释循环“相对主义”的路线。相较之下，钟惺诗学却肯定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具有某种“定质”的要求。他说：“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诗论》），强调《诗》是有其“本事本文本意”的，因而读诗应“求古人真诗所在”，要将“知人”、“知世”作为“以意逆志”的前提条件。所谓“三分诗，七分读”，读者须将自己的“一往深心”与“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的客观诠释相结合，在充分发挥阅读主体性的同时，始终将“古人之精神”作为自己认识客体目标的本体规定性，这样，阅读接受、体验的对象和阅读者的忧思冥想就相互构成了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了。“诗为活物”说较之西方的接受诗学，在强调读者阅读心理作用的同时，还加强了作品本身的质性要求，可以说在阐释理解的全面性上似乎是更胜一筹的。

### 三

对“诗为活物”之因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中西接受诗学的差别之处，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接受诗学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中，更多是在“文本——读者”的向度上展开，并突出强调读者的决定作用。他们“把读者的接受从整个文学活动中割裂出来，孤立地强调其超越作家、作品的决定作用”，<sup>[7]</sup>因此，西方接受诗学所做的或是站在读者的视角上

对作品进行静止判断，或站在作品的角度上对读者的作用进行估量，注重的是对审美阅读活动进行一种静态的实证分析与逻辑演绎，这就不免走向了“主客二分”的思维路径和“相对主义”的主观判决。而中国古代文论却不踏偏颇对峙之途，向来注重整体浑然圆融的统一状态，力图在一种有容乃大之气魄情怀中生成永恒的流动之美。因而，所谓“活物”之说，在强调诗歌等文学艺术样式的“活体”多义性质时，并不做审美主客二体的机械式分割，而是始终将其看成是一个循环运动的“中和”整体，体现出一定的内在统一性与完整性。钟惺的“诗为活物”说关于审美接受的诗学论述涉及了过去很少有人关心的领域，我们将其接受诗学的“金针”巧“度”后世，并用这根金针去穿联起三百年后西方世界的接受理论，在两种跨时空、跨语言、跨文化的诗学理论两相对照下，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诗学所达到的别致和理论深度。

### [参考文献]

- [1] 李先耕，崔重庆. 隐秀轩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91.
- [2] 张国光，李心余，欧阳勋. 竟陵派文学研究论集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19.
- [3] 周宁，金元浦.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4] 瓦尔宁. 接受美学 [M]. 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75：236.
- [5] 蒋孔阳，朱立元. 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09.
- [6] 伊瑟尔. 阅读行为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27.
- [7] 蒋孔阳.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474.